

俄國與東歐諸國的中國文學翻譯

歐茵西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241-244

因為地理位置、政治情況、語言文化等各種客觀條件都相去甚遠，東歐各國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十分疏遠，對中國的興趣相當冷淡。他們大部分乃是透過其他語言的介紹，才逐漸對中國哲學獲致粗淺認識，然後有人進一步研究民間故事與神話，古典詩文與戲曲。所謂漢學研究，包括學習中國語言及翻譯中文作品，最早的歷史在十八世紀，也只限於少數地區。本世紀四〇年代以後，由於政治原因，他們與中國大陸來往密切，漢學家的數字增加，但對現代文學的認識也因此局限於大陸地區。俄國與中國的關係本來即較東歐諸國接近，成果較豐，如今所能蒐集的資料亦較齊全。東歐國家中，除捷克成績令人矚目以外，都並不理想。本文僅能就有限的資料分區概略介紹。

俄國

俄國的情形遠較其他東歐國家為佳。兩百多年前，俄國開始研究中國語言、文化與文學。到目前為止，被譯為俄文的中國文學作品，已接近三百本，而且涵蓋面很廣，包括先秦魏晉時期作品，唐宋詩歌與傳奇故事，元朝雜劇，明清小說，民間故事與神話，敦煌文學，現代詩文……。有的直接譯自中文，有的譯自滿文，也有的是從西方語言轉譯而來。

第一本中國文學俄譯本是1741年出版的《今古奇觀》，譯自英文。1832年，莫斯科出版由法文轉譯的章回小說《好逑傳》，不久，《西廂記》亦經由滿文譯為俄文。

十九世紀四〇年代，俄國學界與讀者對中國語文的興趣逐漸增加，彼得堡與莫斯科大學先後在東方語言學系中開設中文課程，並開始有學生前赴中國留學。他們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帶回俄國，進行翻譯工作，或在自己的創作中添增了中國文學的影響。十九世紀五〇年代後期，辛科夫斯基（O. Senkovskij, 1800-1858）的《文集》中，便有這種改寫自中國小說及戲曲的故事。

十九世紀後期，俄國學界開始有人對中國神話發生興

趣。執教彼得堡大學吉奧吉耶斯基（S. Georgierskij）於1892年出版《中國人的神話觀念與神話故事》，對中國的混沌開闢傳說、陰陽觀、靈魂說、守護神等觀念，加以敘述探討，內容十分充實。本世紀前半葉的馬佐金（N. Macokin），六〇年代的楊希娜（E. Yanshina）和李謝維奇（T. Lisevich），及近期李福清（B. Riftin）等人對中國神話的研究，可謂均以吉奧吉耶斯基為啓蒙。楊希娜於1977年譯成《山海經》，李福清主編翻譯了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並編著《世界各民族神話百科全書》有關中國部分。

對古典小說的研究，俄國人做得很多。二十世紀二〇至三〇年代，俄國出版了知名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Aleksiev）翻譯的《聊齋誌異》。其他主要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鏡花緣》、《老殘遊記》、《孽海花》、六朝小說、唐宋傳奇、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京本通俗小說》、《今古奇觀》等，都在五〇至七〇年代譯為俄文。此外孟列夫（L. Menshikov）為敦煌學專家，對敦煌藏本的深入研究，在當今全球學界亦為數一數二。

俄國學者亦熱心研究宋元平話，他們認為，平話與中國長篇小說有密切關係。現在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的巴甫洛夫斯卡亞（T. Pavlovskaja）曾發表一本《新五代史平話》俄文本，是該書唯一外文譯本。

1981年去世的洛加喬夫（A. Rogachov）曾與科洛洛爾（V. Kolokolov）合譯《西遊記》。曾來華參與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的華克生（H. Voskresenshij）為《儒林外史》譯者。前述之敦煌學專家孟列夫則與帕納秀克（Panajuk）共同翻譯了《紅樓夢》（1843年，《紅樓夢》即曾譯為俄文，是全球最早的外語譯本。）。

對元朝雜劇的研究始於十九世紀上半葉。1880年，瓦西里耶夫（V. Vasiliev）完成系統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其中包括有關中國元曲戲劇資料的介紹。索羅金（V.



Solokin) 為俄國學者中，對中國戲劇的研究最為深入的。他的專著「十三、十四世紀中國古典戲曲的起源、結構、形象、情節」，於1979年出版。

馬里諾夫斯卡亞 (Malinovskaja) 和謝羅娃 (S. Serova) 專研明清戲劇。前者發表許多文章，論述朱有燉、徐渭、葉憲祖、孟稱舜、馮鍾齡、孫鍾齡、呂天成。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東西方，都幾乎不曾有人專門研究過，所以馬里諾夫斯卡亞的文字具有特別意義。謝羅娃則對湯顯祖投注較多心力，1990年出版「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戲劇與中國社會」。

大多數俄國當代漢學家曾赴中國大陸學習中文，他們對大陸近代及現代作家的作品多有了解。魯迅、茅盾、郭沫若、葉聖陶、丁玲、艾青、李季、張天翼，以及馮驥才、王蒙、張辛欣、錢鍾書、蔣子龍、馮雲、阿城……等人的作品，都已有人譯為俄文。對臺灣的作家則僅限於其作品曾在大陸出版過或介紹過的極少數而已，例如白先勇、陳若曦、司馬中原……等人。如今我國與俄國及東歐地區的交流正逐漸開展，且俄國及東歐學者治學的精神至為執著，我們若能繼續邀其訪華參與研討會，進行學術研究，並積極提供圖書資料，可望於今後數年內增進他們對在臺灣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認識。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這兩國家在過去的歷史上始終比較封閉，對於與西方或東方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不很熱衷。到目前為止，他們的中文人才以及對中國文學的認識，主要只仰賴少數曾經留俄的學者為橋樑，因此漢學研究的歷史很淺短，社會羣眾對中國的認識極欠缺。

本世紀後半葉，羅馬尼亞才因為政治因素，與中共建立親近關係，開始有人學習中文，但一般民眾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仍然不高。目前除了轉譯自俄文版的《聊齋誌異》以外，並無其他研究。

保加利亞的情況亦相去不遠，僅《聊齋誌異》與《山海經》有保文譯本，亦係譯自俄文，而讀者有限。

波莉瓦諾娃 (Drumeva-Bolivanova) 曾經留俄，其研究專題為《詩經》，雖因客觀環境所限，中文無口語能力，但她是目前保加利亞唯一的漢學研究學者。

波 蘭

1924年，華沙大學東方語文學系開辦了中文課程。在此之前，波蘭與西方文化的關係就很密切，透過德文、俄文、法文、英文，早已經與中國文化及文學有所接觸。此外，教會也扮演了媒介角色。例如法國耶穌教會便為波蘭

人引進過一些中國古典詩歌與哲學。唐宋與南北朝詩人的作品很受喜愛，1953年出版的《莊子》尤被認為是歐洲最佳譯本。《論語》陸續有所摘譯或被轉述闡譯。

波蘭人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興趣不高。《儒林外史》、《聊齋誌異》是從德文、法文轉譯為波文，且並不齊全。無非選其特別具有民族特色或傳奇色彩者，以滿足一般大眾好奇心為主要考量。

與其他東歐國家一樣，波蘭的漢學研究主要仰賴俄國及大陸，漢學家或曾留俄，或曾在中國大陸學習，對大陸近代作家的作品有或多或少的研究，對臺灣文學則毫無所悉。以目前任教華沙大學的金恩德教授 (Mieczyslaw Künsther) 為例，他對詩歌興趣較濃，譯有多首唐詩及陶淵明的作品，大陸作家中，則鍾情巴金與沙丁。據稱，華沙大學東語系的日文及韓文圖書資料均遠較中文充實，臺灣作家的作品完全付諸闕如。

匈牙利

匈牙利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興趣，兩百年前即有蹤跡可尋，且包括了地理、歷史、民俗、宗教、文學、藝術等各種學問知識的介紹與作品的翻譯。有些古典文學，還一再地被譯為匈牙利文。例如老子的《道德經》共有六種版本，其他重要小說，包括《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亦皆已有匈文譯本。

此外，早在十八世紀中葉，便有耶穌教會支持的學校劇團以匈牙利語演出由元朝雜劇《趙氏孤兒》改編的「中國英雄」。根據匈牙利戲劇學界考證，當時所用劇本係取自義大利劇作家 Metastasio Pietro Antonio (1698-1782) 的作品。而義大利作品的靈感泉源，乃是法國耶穌會神父至中國傳教時，得自於中國文學的。《趙氏孤兒》的題材頗接近聖經中，耶穌聖嬰為逃避希律屠殺而逃往埃及的故事，可能即因此故，才受到教會人士注意，帶回歐洲。

從此，中國戲劇在匈牙利漢學界特別受重視。關漢卿的《竇娥冤》、《救風塵》，李行道的《灰闌記》，鄭廷玉的《看錢奴》，武漢生的《生金閣》，石君寶的《秋胡戲妻》等元雜劇，皆已先後譯為匈文。1936年，布達佩斯劇院還演出熊式一編的《王寶釧》，譯者為匈牙利著名詩人 D. Kontolanyj。《王寶釧》虛擬象徵的手法，與西方直接描述的戲劇傳統迥異，予匈牙利觀眾深刻印象。

匈牙利漢學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興趣亦頗普遍。匈牙利語是一種不同於其他西方語言的文字，似乎特別容易忠實而優美地譯出其他語言的詩歌。匈牙利漢學家常與詩人合作，翻譯中國詩歌。本世紀五〇年代後期和六〇年代，屈原的《離騷》，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淵明等人的詩

歌，許多被譯為匈文。譯文幾可與原作相媲美，讀者對作品中的深刻含義，亦印象甚深。當代漢學家F. Tökew即為屈原專家，他與兩位名詩人Sandor Weöres及Laszlo Nagy合作將《離騷》譯為匈文。另一位漢學家Chogor教授為《水滸傳》譯者，並曾取其精華，改編為話劇，在布達佩斯上演。

曾經來臺的杜克義教授（Ferenc Tökew）也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學者。他在1969年與Chongor教授共同出版了上下二冊《中國古典詩歌選集》，蒐集自《詩經》以迄二十世紀初期共三萬多行詩歌。此一詩選提供匈牙利讀者相當完整的中國詩歌觀念，是很重要的貢獻。前述的元劇《竇娥冤》及《灰闌記》亦為杜克義教授所譯。女學者卡爾瑪（Eva Kalmar）則翻譯過《道德經》和戲劇作品，如《看錢奴》、《生金閣》和《秋胡戲妻》。

目前匈牙利有三所大學設有漢學系或提供漢語教學，但師資及圖書均極有限。因為社會上對中文的興趣並不穩定，老一輩的漢學家有無奈之感，但多願繼續執著於這方面的研究、教學與翻譯工作，他們盼望能獲得較多來自臺灣的支援。

捷 克

十六世紀，捷克人即已經由拉丁文及德文作品，接觸了中國哲學思想與文學。但遲至十九世紀末本世紀初，才出現直接譯自中文的作品。當時布拉格大學東方語文學系除阿拉伯文、希伯來文以外，開設了中文課程。德瓦沙克教授（Rudolf Dvořák, 1860–1920）對儒家及道家思想有深入研究，曾發表一系列專文，並翻譯了《詩經》與《道德經》，為捷克漢學研究奠定良好基礎。從這時開始，迄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學，包括詩歌、民間故事和小說，被譯為捷克文的，總計在二百本以上。

繼德瓦沙克之後，致力於漢學研究的馬特西尤士（Bohumil Mathesius, 1888–1953）精通數國語言、從俄文、德文、法文轉譯了許多中國詩歌與哲學論著。他自己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深喜唐宋詩人寧靜、淡泊、和諧、悠遠的胸懷與氣質，並將這種影響表現在他自己的詩作中，捷克讀者因之更為嚮往中國文化與哲學。1939年，他編譯的一本《古老的中國之歌》，迄今甚受歡迎，已再版28次。評論家認為，馬特西尤士詩歌中的音樂感亦來自中國古典詩，並對捷克作家產生明顯影響。馬特西尤士因此在捷克近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五〇年代後期，許多捷克漢學家因為馬特西尤士的影響，紛紛投入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與研究行列。其中以柯馬士（Josef Kolmaš），史托布洛瓦（Jana Štob-

lová），契爾娜（Zlata Črná），伏拉弟斯拉夫（Jan Vladislav），雷莎瓦（Marta Rysáva），席爾莎（Josef Hiršal）較為知名。他們皆能注意闡釋中國文學的深義與精神，使捷克人民對中國印象良佳，形成一股研究熱潮。

前述學者之外，另有兩位漢學家側重於近代中國詩歌的翻譯，他們是赫琳哥娃（Jarmila Haringová）和史托維茨科瓦（Dana Štovičková, 1929–1976）；兩位都是女士，前者譯冰心詩文，1967年以《繁星與春潮》為題，出版專集，另譯有聞一多的《死水》與《紅燭》。後者則對本世紀二〇至四〇年代的詩歌著力較深。1964年出版的《銀色之馬》，便收集了許多首此一時期的作品，而以艾青的詩歌所佔篇幅較多。

馬特西尤士以外，普魯式克（Jaroslav Prvšek）亦被認為是捷克漢學界的領袖級人物。普魯謝克自三〇年代起，潛心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涉獵甚廣。1937年，譯魯迅的《吶喊》。1940年與馬特西尤士合譯《論語》，並附註解，較歐洲其他版本更為深入而周全，二次大戰期間，曾廣為捷克人所流傳，視之為精神支柱。普魯謝克也經常介紹中國人文與民情，1947年發表的《中國市場奇聞》，便十分多采多姿。同年出版的《老殘遊記》捷文譯本，使捷克讀者進一步認識中國人的傳統與新思想。1955年再譯成《聊齋誌異》。除了這些古典名著，他也對近代文學有所認識，1950年翻譯了茅盾的《子夜》。普魯謝克在捷克漢學界甚受敬重，他的一項重要貢獻是，拓寬捷克漢學界的視野，對古典文學以外的作品亦予重視。

五〇年代開始，克里布索瓦（Berta Krebsova, 1909–1974）譯短篇小說，巴拉特（Augustin Palát）譯《水滸傳》，皆甚受歡迎。巴拉爾（Oldřich Kál）獨力翻譯《儒林外史》（1962）與《紅樓夢》（1986–1988），譯筆忠實流暢，特受到捷克評論界推崇。克拉爾對中國哲學亦甚感興趣，1971年出版的《中國古文選》，選擇一些有關老莊哲學的文章，讀者多為學界人士。

目前執教布拉格大學，並為捷克科學院院士的赫瑪諾娃（Zdenka Hermanova）專研明清小說，其譯作有《醒世姻緣》、《白蛇傳》、《西遊記》，是一位實力深厚的學者。她在五〇年代赴北京研習中文，當時即對孫悟空的故事產生興趣，決定翻譯《西遊記》。為此，她特別先對佛學加以研究，自認收穫至為珍貴。1958年，返回捷克，已完成《西遊記》一千多頁譯稿，但出版商對如此長篇的市場存疑，於是她摘其中部分故事，零星發表，獲得良好回響。捷克讀者認為它們充滿趣味，而且簡單易懂。孫悟空這個角色尤其討好，成為捷克孩童間的風雲人物。1961年，她重予整理，出版了配以生動插圖的捷文本《猴王》。

1964-1992年,《猴王》先後由捷文轉譯為德文、英文與法文。

赫瑪諾娃的兩位同時代人赫德里茨科瓦(Věna Hrdličková)與卡爾窩朵娃(Dana Kalvodova)亦為傑出譯者。前者譯有多篇中國大陸五〇年代作家的短篇小說;1989年出版《春之聲》,主要為八〇年代初期,大陸作家描寫文革災難的文字。後者在1966年發表《桃花扇》的捷文本。

七〇年代及八〇年代初期,捷克與中共的關係處於低潮,中國語言及文學的研究與出版幾乎完全停頓。唯一的例外是洛莫娃(Olga Lomova),她埋首翻譯《三俠五義》,1989年,捷克政治空氣丕變之際,此書問世。

雖因十數年停頓,捷克的中文人才暫有斷層現象,與其他東歐國家相較,捷克的漢學研究仍然成績可觀。目前赫瑪諾娃在科學院率領一個小組,進行捷漢字典的編纂工作。她認為,東歐民主化以來,學術研究的空間更為寬

闊,又因為基礎深厚,捷克漢學有樂觀的遠景。

《資料來源》

B. D. Belivanova: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in Bulgarva, 1992.

Ferenc Tökei: Concerning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into Hungarian, 1992.

Eva Kalma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into Hungarian, 1992.

Zdenkh Hermanwvva: The Czech Transl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1992.

戈雷金娜:中國中世紀文言小說俄語翻譯的作風與手法,1992。

華克生:明清白話小說俄文譯介實踐,1992。

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1991。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文上承自第248頁)

21. M.羅威在此書的書評中,談到了實利本位的文教政策和從蘇美爾(Sumer)學到近代日本研究不分學科,一併歸在東方學部的問題。Michael Loewe, The Shrinking Rice Bowl,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900, 1990, 2, 2.

[譯者附記]

此文原載於日本中國社會文化史學會編刊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第6集(1991年6月)。作者近藤一成先生為早稻田大學教授,是譯者相識多年的朋友。承其以此作見贈,且慮及我國學術界對英國漢學界所知較少,因譯出,以饗學界。

此文譯出後,94年春,在日本東洋文庫遇到英國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杜德橋(Glen Dudbridge)先生。我們圍繞著《英國中國學小史》一書,談起英國中國學的狀況。

他說,《英國中國學小史》,實際上是一種諷刺性著作。此書把英國的中國學說得一無是處。這基本上是反映了英國19世紀以前的中國學的狀況。進入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中國學已經走上了正規化研究的軌道。二戰期間,西方國家對日作戰,客觀上形成了許多學者學習日語的局面。戰後,這些學者又轉向了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研究。可以說,這一代學者受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影響較大。這一代學者對中國典籍大多只能看,不能讀,也不大會講漢語。他們就是我的老師輩。繼他們之後的英國中國學者,則直接學習漢語,接受的是「五四」以來中國本土的漢學研究成果。

杜先生還說,《英國中國學小史》的作者,為了刺激英國政府對漢學的重視,對英國漢學歷史上好的事情不寫,只寫不好的事情,這實際上是一種消極的方式。我並不贊成。我希望英國的學者們都像李約瑟那樣,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來贏得重視。